政治科學論叢 / 第 68 期 / 民國 105 年 6 月 / 頁 77-102

俄羅斯利益團體的形成與演進*

連弘宜**

摘　要

工業革命後，除了改變了人類生產活動的過程，亦帶動西方國家的社會變遷，工業社會於焉成形。利益團體逐漸萌芽，在西方民主政治數百年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原本屬於社會主義國家及一黨專政的蘇聯，國內並無任何利益團體的存在。1991 年底解體後，俄羅斯在政治改革方面朝向民主化發展，經濟上則採取快速邁向市場經濟的休克式療法。一時之間俄羅斯國內的利益團體快速發展，然這些利益團體不僅產生的方式不同，其作用與類型亦與西方大異其趣。本文首先要辨明俄羅斯利益團體的類型與性質，而後再就其發展加以比較，藉以了解前蘇聯國家不同類型利益團體的發展，以及其與西方國家利益團體相異之處。

關鍵詞：利益團體、壓力團體、俄羅斯政治發展、寡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DOI:10.6166/TJPS.68(77-102)。
**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專任副教授，E-mail: hylien@nccu.edu.tw。
收稿日期：105 年 3 月 9 日；通過日期：105 年 6 月 28 日

壹、前言

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自工業社會出現以後，便不斷影響著西方各國的政治發展，各國利益團體的發展狀況各自不同，其對國內政治發展的影響力亦各有所異。以美國觀之，利益團體不僅可影響立法及政策決策過程，在美國的地方（州）政府憲法的修改中，亦扮演舉足輕重角色（高永光，2003）。Theodore J. Lowi 更指出，利益團體的出現，使美國政治形成鐵三角（利益團體、國會委員會及行政部門）的封閉決策圈，嚴重影響著美國的民主政治運作（2009）。英國的利益團體主要係在國會發揮作用，這些利益團體雖未獲得正式上的認可，在傳統上一直卻獲得廣泛的承認，在下議院中，某些議員經常代表著一些職業團體的共同利益（Jacques-A Basso 著，陳浩譯，1990：48-49）。

1991 年底蘇聯解體，獨立後的俄羅斯在經濟上面臨市場經濟的轉型陣痛期，同時爲了求取西方國家的金援，在政治上採行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經濟上的轉型使得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各行各業的大型企業形成個別的利益團體；政治轉型催生多黨制，然而先前蘇聯時期的強力部門幹部（Siloviki, Силовики）亦逐漸形成一股政治勢力，這股政治勢力亦轉變爲一個龐大的政治利益團體。俄羅斯的政經轉型使得原先在前蘇聯時期不會產生的利益團體逐漸成形，然而這些利益團體的類型、內涵及作用由於俄羅斯的獨特政治與經濟發展，全然迥異於西方。本文試著處理以下問題：在俄羅斯獨立後，利益團體如何產生？利益團體產生後，其特徵與內涵如何？目前俄羅斯的半總統制中，利益團體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如何影響俄羅斯的政治發展？俄羅斯的利益團體與西方的利益團體有何不同？然爲聚焦於這些問題的探討，本文的研究範圍不及於俄羅斯的民主表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貳、西方利益團體的概念與俄羅斯利益團體的興起

一、利益團體的基本概念

㈠利益團體的定義、特性與類型

1. 利益團體之定義

利益團體的定義不一，亦有學者將其稱之爲壓力團體，壓力團體的名稱具有負面性質，意即將私益置於首位（優於公益），具有共同目標並向政府施壓之團體，亦有學者指出壓力團體乃係利益團體的一種（張世熒，2000:38）。由於壓力團體的貶抑性較無法維持社會科學的價值中立性，因此本文以利益團體做爲研究之標的。綜觀學者對於利益團體的定義，可以歸納出較爲廣義或狹義定義，採取較爲廣義的學者，如 Herbert M. Levine、David Truman 及 Graham K. Wilson 等是，認爲利益團體乃係「一群具有共同目標之人的結合，這些目標透過成員間的互動而達成，企圖影響政府的決策」（Levine, 1982: 189-191）；依據廣義的定義，利益團體具備幾個條件：其一，具有共同目標；其二，一群人的結合；其三，企圖影響政府的決策。然而狹義的利益團體，除了上述的幾項條件外，尚須具備制度化的體制，如 Graham K. Wilson 等是。Graham K. Wilson 認爲，制度化的體制可以使團體的需求趨於一致（1981：14-16）。

一般認爲利益團體的形成與社會複雜性（經濟專業化及社會差異化）的增加有關，在農業社會時代，農民之間雖具備共同利益或目標，卻無法形成現今的利益團體。學者杜魯門認爲最主要因素在於當時的社會尚無法形成經濟專業化與社會差異化，導致農民之間缺乏政治與經濟的理由團結起來（Truman, 1973: 154）。

2. 利益團體之類型

利益團體的類型繁多，如以利益團體所追求之利益來區分，可分爲經濟性利益團體及社會性利益團體。前者只追求物質上利益，例如美國乃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實施聯邦制的國家，因此地方政府的財政權獨立自主，19 世紀時美國曾出現許多公司與團體，皆靠地方政府提供經濟補助、財務及土地支援等。後者則注重社會價值，例如反墮胎、反種族歧視及貧窮人士的照顧等（謝青雷，1988：24-25）。在工業革命以後，政府逐漸積極參與經濟活動，有學者以工業重商主義形容之（張亞中，2007：210-211），這些情形皆促使政府逐漸開始實施某些維護社會價值的政策，無形中壯大某些社會性利益團體。

亦有以利益團體的組織態樣及程度來分類，如 Gabriel A. Almond 及 G. Bingham Powell 將利益團體分爲四個種類：異常型（anomalistic）、非協會型（disassociation）、制度型（institutional）及協會型（association）。異常型的利益團體不具備任何組織形式，僅係一群由偶發事件聚集在一起的民眾，惟這些群眾仍具備共同目標，以及企圖影響政府之決策，因此仍屬利益團體之一種。非協會型與異常型同樣不具備任何組織形式，惟相異之處在於非協會型利益團體的民眾具備某種共同的特徵，例如宗教及血統等。制度型利益團體已經具備正式的組織形式，如一般政黨及官僚機構等，而這些組織的組成雖另有目的，然大多即是該利益團體所要追求的共同目標。協會型利益團體與制度型利益團體相較之下，組織的目的完全即是該利益團體所要追求的目標（1978 : 170-176）。採取同樣分類的學者尚有 Paul Pross，以利益團體的能力與組織程度做分類，可得出四大類利益團體：議題導向（issue-oriented）的利益團體、尚未完備（fledging）的利益團體、成熟（mature）的利益團體、完全制度化（fully institutionalized）的利益團體（1986）。

自從社會學家 Max Weber 提出理念類型（idea type）來解釋世界上的現象後，類型化（typification）便成爲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途徑，而政治學亦不例外，將利益團體加以類型化，便可更適切地解釋與比較不同利益團體在政治決策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與角色。本文在研究不同利益團體在俄羅斯政治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時，首先須辨明俄羅斯的利益團體與西方利益團體的差異，其次將俄羅斯利益團體做初步的分類，再仔細分析這些種類的性質與功能（Cardiff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2010）。

臺灣大學圖書館

㈡西方國家利益團體在政府決策中的角色

1. 實施遊說活動

西方利益團體常透過遊說方式來滿足自身所欲達成之目標，在西方的不同政治體制中，利益團體遊說的對象也不同。內閣制的國家行政權與立法權皆集中於政府，因此利益團體遊說的對象除了下議院的議員外，尚須兼及政府之部會首長，始得收遊說之效。實行總統制或分權的國家則需將遊說對象集中在行政或立法部門，遊說一方來對抗或制衡另一方，使政策或法案內容與該利益團體之訴求一致。

2. 利益團體與政黨

採行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該國利益團體與政黨之關係亦不同，例如採行內閣制的英國，國會（上下議會）的政治權力強大，促使利益團體與政黨合作，英國工會與工黨之關係即係如此。採行總統制的國家，利益團體與政黨之關係較爲疏離，此係因爲政治權力多被總統掌握，不在國會。

3. 宣傳活動

利益團體除了遊說政府機構與國會之外，對社會大眾的宣傳也十分重要，宣傳活動可以使利益團體的訴求深入社會大眾，形成一股社會輿論與不可小覷的民意。現今的宣傳活動主要透過大眾媒體、演講及集會遊行等方式，惟多數的利益團體並不希望過於高調，因此當相關利益團體希冀之法案或政策提出時，絕大民眾並不清楚這些利益團體的名稱或背後付出的時間與努力，除非利益團體親自特別宣傳或說明。

4. 競選活動的參與及介入

西方利益團體致力於行政或立法相關機構的遊說，但是無法收到應有效果時，只好採行其他途徑，例如，對國會議員選舉時的若干作爲。當國會議員選舉時，需要選民的支持，而利益團體亦具有民意基礎，倘若國會議員候選人有意攏絡，利益團體可信賴該候選人當選後提出相關法案，雙方將促成合作。因此利益團體參與國會議員的競選活動拉抬民意支持度，亦屬間接實現團體目的之一種方式。此外，競選經費的資助亦爲利益團體

臺灣出版書籍資料庫

與候選人之間的重要連結之一，例如美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即爲利益團體合法的競選經費捐助組織（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14）。

西方利益團體影響政府決策的方式，係歷經百年的演變形成，已成爲西方政治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然而隨著全球民主化的進展，西方的政治文化亦不斷影響非西方國家，使得非西方國家也開始出現性質相類似的團體。然而非西方國家國內利益團體的形成因素很多，且利益團體的作用也與西方有別，尤其是前共產國家因爲政經改革所形成的各種政治與經濟利益團體，例如，俄羅斯與中國等是。

二、俄羅斯經濟發展與利益團體的出現

㈠俄羅斯震盪療法經濟改革與寡頭－經濟利益團體的形成

1. 葉爾辛時期的經濟改革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共產主義國家紛紛走向市場經濟之路，以蘇聯經濟互助委員會（Сов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的經濟體系面臨崩解。然而後共產時期的經濟改革方式可分爲兩種，即激進式改革（radical reform）與漸進式改革（gradual reform），前者又被稱之爲休克式療法（shock therapy），透過嚴格緊縮的貨幣政策，大幅壓縮國內消費，並將原本國有財產及國營企業大量地私有化，此法多適用於國家面臨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時；後者則強調在既存的社會主義憲法制度與工業化基礎上進行改革。前者如智利與俄羅斯等是；後者則以中國爲適例（Klein, 2007）。

1991 年 6 月葉爾辛上台後，隨即實施經濟改革政策，首先從價格自由化著手，然而價格自由化卻造成物價上漲及盧布惡性通膨問題，國內面臨嚴峻的供需失衡（蘇聯的解體使經互會體系瓦解，工業生產的原料及其他生產要素被切斷造成供給萎縮）。面對惡性通膨，葉爾辛採取休克式療法，實施嚴格的貨幣緊縮政策及私有化政策，企圖複製智利的成功經驗。然實施的結果卻不如預期，首先貨幣緊縮政策惡化國內企業的投資，使得剛實施私有化的若干國有企業雪上加霜，企業嚴重虧損。1992 年 6 月，俄羅斯

臺灣上市櫃公司資訊庫

政府通過《1992 年俄羅斯聯邦國家及地方企業私有化改革綱領》（The Federal Program of Privatization of State and Municipal Enterprise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 1992），將國有企業以發行證券的方式進行私有化改革（Hancock and Logue, 2000: 14-16）。

俄羅斯的私有化改革可以分爲三階段：證券私有化階段、貨幣私有化[1]階段及個案私有化階段。在第一階段（1992-1994 年）主要以國有企業證券的無償發放爲實施重點，將證券無償發給人民，此外更使原先的國有企業職員可購買該企業 51% 的股票，或無償獲得 25% 的該企業股票。無償發放證券具有政治及經濟目的，不僅可以提高現行執政者的支持度，更可適應當前國內資金缺乏的現實狀況。第二階段（1994-1992 年）的私有化重點在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格出售國有資產，與第一階段相較，本階段的主要目的係形成企業長期的投資者，這些投資者需要長期控股，而出售的價金則成爲企業內部結構轉型的資金與國庫重要收入。第三階段則係停止大規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將需要進行私有化的企業由國家杜馬批准，並個別擬定私有化計畫（陸南泉，2007：29-31）。葉爾辛的經濟改革政策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技術的精進。在私有化的同時，尚未擬定相關提升本國產業技術的相關計畫，導致俄國經濟產業單一化的現象始終未獲改善。（Мартынов, 2010: 3-4）

2. 寡頭的形成與經濟利益團體

在俄羅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中，由於相關的法制規定尚未周全，使原本掌握權力的政府部門或資金的銀行人士取得可乘之機，而寡頭以形成的背景可分爲產業主導型與銀行主導型兩大類。前者的前身多半爲政府部門機構，在政府部門轉型至公司或協會的過程中，使原先具備主導權的部門繼續在新的產業部門中掌權，形成時間約在 1993 年左右；後者則於戈巴契夫時期的金融改革時形成，並於 1992 年葉爾辛的私有化改革中取得輕工業企業的證券，成立控股公司快速增加資產（王定士，2001：32-34）。

[1] 貨幣私有化乃係無償國有資產轉讓的下一階段，此階段國有資產不再無償轉讓，而是透過市場價格有償轉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俄羅斯寡頭的現象，某些學者認爲，俄羅斯的計畫經濟已實施近 60 年，要令其數年之內完全變成市場經濟必定不可能，因此俄羅斯的寡頭現象與前蘇聯時期所實施的中央計劃經濟高度相關（Smith, 1995: 81-82）。另一方面，1992 年 12 月蓋達爾（Yegor Gaidar；Егор Гайдар）的下台也是促進寡頭形成的重要因素，蓋達爾是俄羅斯獨立初期經濟改革的主要策畫者，然由於改革的失利使得國內的前蘇聯保守派及產業菁英獲得可趁之機，切爾諾梅爾金（Viktor Chernomyrdin；Виктор Степанович Черномырдин）成爲新一任總理。1985 年切爾諾梅爾金曾任秋明天然氣工業聯合公司（Tyumen Gas Industry Corporation；Тюмень газпром）領導人並被稱爲天然氣大王，產業背景的出身使得俄羅斯的寡頭發展如虎添翼，1993 年底葉爾辛簽署總統令第 2096 號，確立金融工業集團建立的計畫（Globalsecurity.org, 2015；Central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2004）。

1996 年，這些寡頭的發展逐漸深根在以下三大類產業，其一，金融產業集團，係由各大銀行所主導，例如，七大銀行集團中的斯莫林斯基（Alexander Pavlovich Smolensky；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Смоленский）的首都農民銀行集團（SBS-AGRO Bank；СБС-Алро）及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Borisovich Khodorkovsky；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的梅納捷普集團（MENATEP；МЕНАТЕП）等；其二，能源工業集團，該類集團係由產業所主導，切爾諾梅爾金擔任總理之後能源工業集團的重要性漸增，[2] 尤其是在其他產業發展不振的情勢下，能源工業集團成爲俄羅斯主要的外匯收入來源，其中以盧克石油公司（Lukoil；ЛУКОЙЛ）爲最；其三，軍工產業集團，該類集團亦係由產業所主導，在葉爾辛上台初期的發展並不順利，其主因在於該時期人民所關注的是國內經濟的改革成效，軍工產業被視爲人才與資源浪費的大本營，主政者所思考的是如何將該產業的人才適度地轉移到其他產業。然這個情形在西方金援口惠而實不至的情形下逐漸轉變，民族主義者開始認同該產業的存在，根據 1993 年 11 月的《俄羅斯

[2] 切爾諾梅爾金不僅可被視爲是能源工業集團寡頭的代表，亦可將之視爲是斯時國營產業內部經理階層勢力的代表（未升任副總理前），此觀之公民聯盟（Civil Union, Гражданский союз）當時對其的支持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軍事準則》（*Russian New Military Doctrine；Новая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該準則分析俄羅斯軍事安全與現代戰爭的性質後指出（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0），由於安全威脅已從全球性轉爲區域性，俄羅斯必須建立一支合理因應現代化戰爭的部隊，尤其是快速反應部隊及高科技武器的部署與配置（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15b）。1993 年的俄羅斯新軍事準則的通過使軍工產業集團的生存重新注入活水，該類集團並無著名的企業，此係由於其產業的特殊性與秘密性使然。

然而這些寡頭是否即屬經濟利益團體，兩者之間的關係爲何，不無疑義。經濟利益集團的特性需有特定的共同目的，並透過向政府施壓或其他方式，實現自身的共同目的。觀察俄羅斯初期形成的寡頭可以看出，這些寡頭趁著葉爾辛執政團隊的經濟改革失利，與守舊派人士結合，使原先的總理或相關首長下台，將符合自己利益或勢力的人選更換上任，例如，「天然氣大王」切爾諾梅爾金的上任等是。是以前共產國家的經濟轉型，催生一股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的經濟利益團體勢力，這股勢力對於政府的影響力甚至超越傳統西方的利益團體，可以直接擔任政府首長，形成有利於己的政策，壯大經濟利益團體的勢力。

對於俄羅斯的寡頭來說，幾乎在當時皆能影響政府決策，使決策的制定與實施有利於自身，然非所有的俄羅斯寡頭皆能具備此種能力，某些集團的規模過小，因此影響力有限或缺乏特定的共同目的，即非屬於西方的經濟利益團體。然可確定的是，俄羅斯寡頭的內涵與特性皆屬於西方的經濟利益集團，甚至能力更勝於後者。

㈡俄羅斯政治改革與強力部門幹部－政治利益團體的形成

1. 政治改革的實施

俄羅斯的政治改革發軔於戈巴契夫時期，原本戈氏所提倡的經濟改革無法獲得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支持，因而轉向政治改革，其先後提出「公開性」（Glasnost; Гласность）與「新思維」（New political thinking；Нов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來改革政治體制。「公開性」於 1986 年蘇共第 27 屆代表大會提出，其主要內涵便係給予民眾更多的言論自由，藉此促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民參與公眾事務，挑選特定的政治議題。戈氏此舉意在剷除或壓制蘇共黨內的保守派勢力，根據蘇共第 27 大所通過的新黨綱規定，任何共產黨員皆具有在黨代表大會及各級委員會全會發表意見的權利，顯然戈氏意欲將群眾的言論自由帶入黨的決策機制中，藉此打破黨中保守派長久掌權的情勢。然而民眾之言論猶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威脅到的並非僅止於共產黨內的保守勢力，連整體共產黨的統治亦將因此動搖。1988 年的第 19 屆全國黨代表會議確立建立一黨多元主義的原則，另一核心議題爲黨政分離，前者係爲實現戈氏所欲達成的壓制保守派目標；後者則影響到後來的黨「改造」工作，當共產黨的「改造」工作非由黨內人士推行，共黨的領導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郭武平，1999：21-24；Newton and Tompson, 2010: 27-36）。

1991 年 8 月爆發的「八一九政變」使戈氏與蘇共的統治一步步推向末路，由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Gennady Ivanovich Yanayev；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Янаев）所領導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State Committee for the State of Emergency；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чрезвычайному положению, ГКЧП）以戈氏的改革過於激進爲由發動政變，可說是蘇聯時期共黨內保守勢力的最後反撲，雖然政變在短短的 3 天後以失敗告終，卻使各加盟共和國加速脫離蘇聯，使得蘇聯於 1991 年 12 月解體（尹慶耀，1995：4-9）。菁英政治本爲蘇聯時期重要的權力結構，層層節制的政治體制爲其形成之主因，然而蘇聯的解體使得原本的菁英政治產生變化，再加上葉爾辛的憲政改革與經濟改革，菁英政治的勢力逐漸分化與轉換（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2005: 104）。

俄羅斯在葉爾辛的領導下脫離蘇聯自行獨立，1991 年 6 月葉氏當選俄羅斯總統的同時，亦發布主權宣言，7 月與立陶宛相互承認爲主權獨立國家。葉爾辛上任後，主要的政治改革皆體現於憲法的制定與修改，1991 年曾擬定兩份憲法草案，一份係由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Imranovich Khasbulatov；Руслан Имранович Хасбулатов）所提出的立法權高於總統權的版本；另一份則係由葉爾辛主導的總統權獨大版本，兩套版本的僵持仍爲國內保守勢力與改革勢力間的競爭。1993 年所推出的新憲法草案表面上停止兩套憲法的爭執，卻引發葉爾辛與國家杜馬之間更白熱化的衝突，葉爾辛宣布解散

臺灣大學圖書館授權典藏

國家杜馬，國家杜馬則宣布解除葉爾辛的總統職務，由副總統魯茨柯伊（Alexander Vladimirovich Rutskoy；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уцкой）代理總統職位（Daniels, 1998: 178-181）。然有其他說法認爲，葉爾辛與國家杜馬之爭主要源自於改革派對於第一次車臣戰爭失利與經濟持續惡化的不滿（Скакунов, 2000: 14-15）。

總統與國家杜馬之爭最終以葉爾辛勝利告終（史稱十月事件），並以全民公投的方式通過舉行新的國家杜馬大選。十月事件後俄羅斯的政治體制成爲半總統制，總統權力獨大，此種體制亦延續到普京時期。

2. 普京的上台與強力部門幹部的茁壯

普京 2000 年第一次上台時，由於權力基礎尚未穩固。儘管葉爾辛的家族與親信皆離開權力核心，惟某些官員卻藉由「金色降落傘」[3]（Golden parachute, Золотой парашют）的方式持續在某些領域上發揮影響力（Hoy "ИПП", 1995）（Kolb, 2007: 1023）。例如卡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於 1999 年 5 月（葉爾辛政府時期）上任俄羅斯政府財政部長後，在 2000 年 5 月普京上台後擔任俄總理一職。普京爲了鞏固自身的權力，開始陸續引進「強力部門幹部」（Siloviki, Силовики），這些幹部主要來自於昔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for State Security, 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簡稱 KGB）、「情報部」（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及「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簡稱 FSU），因此這些幹部多分布在兩個領域：其一爲國家安全領域；其二爲內政部門。

---

[3] 「金色降落傘」原本係公司收購的一種預防機制，意即藉由對於被併購公司的高階管理人員的金錢補償，來防止企業或公司的惡意收購行爲。然而此概念卻輾轉被應用到政府的更迭，當政權替換時，前朝官員可因此獲得高額的金錢補償及被新政府安插在重要的職位上。俄羅斯媒體曾用此名詞來解釋葉爾辛前朝官員在普京時期高升的現象，然而所謂的「金色降落傘」顧名思義就是要降落，亦即不在機上（內閣），因此如果以內閣來理解這個現象，或許用詞的適切性需要再重新思索（因爲前朝官員仍在內閣中）；但如果將葉爾辛時期的內閣與普京時期的內閣視爲不同的「飛機」，或許可以稍微彌補一下用詞的缺陷。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強力部門幹部」在葉爾辛總統時期已逐漸凝聚勢力，1996 年俄羅斯總統第一輪選舉時，軍警與國家安全機構的官員皆投票給將軍列貝德（Alexander Lebed；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Лебедь），在 2000 年的總統大選中，這些官員轉而支持普京，進而使普京以 53.4% 的得票率當選總統（University of Essex, 2000）。惟這些幹部在普京第一次上台之初仍未掌握國家實權，且前總統葉爾辛的勢力亦尚未完全清除，是以此時期對俄羅斯政治發展的作用仍極其有限。

3. 強力部門幹部與政治利益團體

觀察強力部門幹部的分布皆已深入俄羅斯政府部門，尤以國家安全部門與內政部門爲大宗。強力部門幹部的形成背景與前述之寡頭相類似，皆係於體制改革或政權更迭時出現，且多發生於共產國家的後共產時期。由於改革的進行，寡頭與強力部門幹部皆直接進入政府部門擔任要職，這與傳統西方的政治利益團體發展相異，然而強力部門幹部是否爲西方政治學所定義的政治利益團體？端視俄羅斯的強力部門幹部觀之，他們具有共同的記憶與職業特性，皆爲昔日蘇聯時期國家安全部門幹部，對於各種事務的處理還停留在冷戰思維。在普京上台後皆被任命爲政府要員，目的皆是在鞏固普京的勢力，當普京開始以反貪腐的名義對之進行整肅時，他們也具備共同的目標，亦即保持或鞏固自身的政治勢力，是以強力部門幹部具備共同目標，成爲普京政府中一股強大的守舊勢力，這股勢力與新進入政府的法治派人士分庭抗禮。

需先說明的是，西方學者認爲利益團體具有一項特徵，亦即試圖影響政府的決策，而強力部門幹部本身即爲政府官員，是否不符合於此一特徵？本文認爲，此與非西方國家特殊的民主政治發展歷程有關，事實上，西方政治學之概念要完全用以解釋非西方國家的民主發展有其難度。然而強力部門幹部並非完全都安排在政府部門中，亦有相當部分存在於國營企業，是以俄羅斯強力部門的人馬橫跨於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亦橫跨於政治與經濟部門。此種情況並不存於西方國家，可說是俄羅斯特有的利益團體類別。強力部門幹部對於政府政策的影響力亦大於西方傳統的政治利益團體，西方的政治利益團體僅能透過遊說政府、參與選舉及媒體宣傳來達到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影響政策形成的目標，強力部門幹部卻能透過政府部門的要員直接形成有利於己的政策，此爲共產國家進入後共產時期的特有現象。

參、俄羅斯利益團體發展與政黨政治

一、葉爾辛時期之經濟利益團體－寡頭的得勢

1996 年總統大選，葉爾辛以獨立參選人的身分，第一輪獲得 35.8% 及第二輪 54.4% 的得票率贏得該次大選。第二名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參選人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以第一輪 3.3% 及第二輪 3.7% 之差敗選（Colton, 2000: 234-235）。顯然在葉爾辛的第一任任期內，人民對於政府的政經改革並不滿意，使得葉氏在連任的選戰中險勝。寡頭的形成與茁壯，逐漸掌控及影響俄羅斯的政局，由於經濟改革的不利，使得葉爾辛政府民心盡失。1996 年總統大選前的俄羅斯政局開始有兩大勢力的崛起－寡頭與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前者的形成與壯大前已述及；後者則係承繼及代表國內保守派的勢力，從俄羅斯獨立初期的激進經濟改革時期，保守勢力便一再威脅改革派的政權，「十月事件」爆發後保守勢力支持的強勢國家杜馬版憲法正式宣告失敗。然這些保守勢力並未消失，持續以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形式存在。

1993 年的國家杜馬選舉中，俄共黨獲得 65 席（總席次爲 450 席），爲第三大黨（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14）。1995 年的國家杜馬大選俄共黨爲最大贏家，此係因葉爾辛的政經改革失敗所致，一共獲得 157 席，成爲國家杜馬最大黨（Политика, 1996）。如此形勢迫使葉氏必須面臨兩個選擇，其一，與俄共黨共享權力；其二，利用寡頭的政治勢力，壯大自己的聲勢。最終葉氏選擇與寡頭合作，雙方的對價關係爲葉氏直接任命寡頭爲政府要職；寡頭則提供自己擁有的媒體作爲工具，包裝葉爾辛及灌輸人民葉爾辛是國家穩定與進步的唯一選擇。例如，1996 年葉爾辛分別任命別列佐夫斯基（Boris Abramovich Berezovsky；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Березовский）與波塔寧（Vladimir Olegovich Potanin；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爲俄羅斯第一副總理及俄羅斯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別列佐夫斯基收購或

臺灣大學圖書館授權資料庫

持有多家俄羅斯媒體公司多數股份，其中包括俄羅斯公共電視台（Public Television of Russia；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левидение）、第六電視台（TV-6；TB-6）、獨立報（Nezavisimaya Gazata；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及生意人報（Kommersant, Коммерсантъ）（Russian Mafia, 2010）。這些媒體在 1996 年的總統大選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成功地使葉爾辛取得連任。

寡頭在葉爾辛時期的政局可呼風喚雨，即使 1996 年葉爾辛取得連任後曾一度試圖過河拆橋，將這些寡頭勢力消滅，畢竟寡頭控制國家的命脈，倘若也可在政壇上呼風喚雨，葉爾辛政府將成爲專爲寡頭服務的傀儡政權。而且葉氏對於寡頭的利用亦僅止於選舉的資金與大眾媒體宣傳工具（張樹華，2001：163），寡頭並未具備民意基礎，人民對他們的普遍印象不佳，不宜長期與其合作，寡頭之間的鬥爭亦常透過違法政商關係的連結動用大量人力與資源，使俄羅斯的政經局勢處於不穩定狀態。然俄羅斯的寡頭勢力有時亦會與「家族」勢力聯姻，成功聯姻的寡頭橫跨兩大勢力，並不畏懼葉氏對於寡頭勢力的整肅，例如，俄鋁業大亨德里帕斯卡（Oleg Vladimirovich Deripaska；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Дерипаска）即爲適例（Reguly, 2012）。

但有鑑於葉爾辛勢力的不足，「家族」勢力雖然逐漸成形，卻無法具備寡頭的財力與媒體控制力，然葉氏仍未曾放棄整頓這些寡頭。在 1998 年 9 月新任總理普里馬可夫（Yevgeny Maksimovich Primakov；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上任後，曾經透過專家學者的意見推動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聯合會制定一系列的法規與經營規則，然而這些法規的制定與施行在 1998 年的金融危機後便陷於停滯，往後更由於政權的頻繁更迭，使得政府完全無暇推行這些法規直至葉氏下台。寡頭也因爲金融危機與政權更迭開始失勢，前者的爆發導致銀行的倒閉與整併風潮，使這些寡頭的資產面臨危機；而政權的更迭切斷寡頭與政府間長久的緊密政商關係，當政商關係無法如昔，寡頭們的政治權力便極其有限（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15a）。寡頭在葉爾辛時期對於國家的影響力是全面性的，不僅在政治、經濟層面，軍事方面也因爲軍工集團的出現與寡頭間的連結而成爲寡頭的影響力所及範圍。

因此葉爾辛時期的政治局勢可以以古希臘雅典的寡頭政治（oligarchy）稱之，寡頭少數人把持政權，猶如古代國家的貴族政權。俄羅斯獨立以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建立的民主政治成爲形式的民主，單就憲法觀察，「十月事件」以葉氏獲勝告終，而後採行半總統制，將俄羅斯政治體制發展推向新的時期。葉爾辛雖然形式上集大權於一身，卻使國家的政權更容易被其他勢力架空，當總統的改革不彰時，只好求助於國內其他勢力尋求連任。葉爾辛執政時期的寡頭成爲擁有國家全面性權力的利益團體，完全無需透過合法的管道主張自己的目標，政商之間已經喪失應有的分際，嚴格的說這是寡頭政治下的貴族階層，民主制度蕩然無存。

二、普京第一次執政時期

㈠經濟利益團體－寡頭的失勢

經歷過 1998 年的金融危機與政權更迭後，葉爾辛與普京權力交接時期的寡頭已經是強弩之末，現在普京有機會實施葉氏執政末期所欲改革的相關法規與政策。普京於 1999 年底代理葉氏的總統一職，當時面臨第二次車臣戰爭，民眾期待政府對於分離主義分子的處理上採取較爲強硬的作法，剛好 2000 年將舉行總統大選，普京便藉此機會拉攏民心。1999 年 12 月，俄軍進攻格羅茲尼（Grozny, Грозный），1,500 名叛軍被殲滅（Seely, 2012: 310-311），對車臣分離主義戰事的順利開始提升普京的民調，且寡頭別列佐夫斯基爲了確保自身的權勢，開始利用旗下的媒體對普京歌功頌德，企圖討好普京，但是普京也有其政治判斷，認爲現在民心已極度厭惡這些寡頭的存在，整肅寡頭勢在必行（Arkady, 2013）。因此與其說是普京整肅寡頭，倒不如說是人民要寡頭消失。

在整肅寡頭的措施上，普京基本上延續原本葉爾辛的政策，亦即透過相關法規的修訂，使政府的權力得以從寡頭中收回，並規制寡頭的違法行爲與經營管理。普京於 2000 年 5 月上台後，所面臨的勢力不只寡頭，包括葉爾辛時期的「家族」也是其所欲整肅的對象，然而整肅「家族」勢力相較於寡頭較爲容易，此係由於其權力基礎繫於葉爾辛一身。爲了鞏固自身的政治勢力，普京首先批准第 849 號總統令《俄羅斯聯邦總統駐聯邦區全權代表條例》，將地方自治的權力回收至中央，將聯邦劃分爲七個區域，每個區域由總統任命全權代表，該代表具有優於地方民選首長的權力，且七

位全權代表皆兼任國家安全會議委員。因此普京有機會藉由全權代表的任命，安排自己人馬到地方，總統權力相較葉爾辛時期更爲擴張（劉向文，2001：24-31）。

打擊寡頭勢力的方式主要可分爲兩種，其一，安排自身的人馬至政府要職，強力部門幹部的引進便係因此而生；其二，恢復政府管控國家經濟的能力。前者的部分在本文政治利益團體之形成的部分已有介紹；後者則透過兩種方式達成：修改現有法制及追溯起訴及打擊寡頭違法行爲。2000年 6 月，寡頭波塔寧的國際羅斯集團（Interros Group）被檢察官指控於 1997年非法併購諾里爾斯克鎳公司（Norilsk Nickel；Норильский Никель），而後令其繳回 1.4 億美元不法所得（Russian Mafia, 2015；Медведев, 2001: 102）。2000 年初，別列佐夫斯基被指控資助車臣的叛亂，以及一些詐欺案，別氏於同年 5 月逃亡至英國，並說服英國給予其政治庇護（田浩卓，2006），其餘的寡頭大多先後被指控違法而深陷囹圄。在修改既有法制的部分，普京宣稱爲了使國家經濟繁榮發展，政府中的行政官僚不應過度介入企業的經營，於 2001 年通過 14 項法律修正案，使政府官員減少對企業的檢查與批覆。一方面修法減少政府官員對企業發展的干預，另一方面卻開始建立國家對國內市場的調控制度，減少寡頭以產業操控市場的影響力（張樹華，2001：325-326）。

㈡政治利益團體－強力部門幹部的崛起

關於普京第一任期強力部門幹部勢力的形成，因前已述及在此不再贅述，本段將著重在第二任期該股勢力與普京之間的互動與變化。在普京的的第二任期內，強力部門幹部開始與「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勢力逐漸融合，並於 2007 年國家杜馬大選大獲全勝，獲得 64.3%得票率（Правда о Путине, 2016）。該黨政治勢力逐漸茁壯，2008年普京就任「統一俄羅斯黨」黨主席後，這些官員的聲勢更加浩大，幾乎滲入了政府及國營企業的權力核心。

普京在第二任任期結束前，便開始選擇接班人，當時被外界認爲熱門的接班人選共有時任第一副總理的梅德韋傑夫（Dmitry Anatolyevich Medvedev；Дмит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與 2007 年 2 月新任命的第

臺灣政治學會網站專用

一副總理伊萬諾夫（Sergei Ivanov；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普京接班人的採擇背後隱藏著強力部門幹部與新進法治派人士兩股勢力之爭。以普京的角度觀之，此次接班並非實際上的接班，只是礙於總統連任次數的規定而不得不暫時交出總統寶座，倘若選擇強力部門幹部出身的伊萬諾夫，待伊氏做滿一個任期後，難保其不會藉由自身在強力部門幹部中的影響力，挑戰普京在國內政局的勢力，使未來重返總統之路再生變數。相較之下，梅德韋傑夫出身非強力部門，且在大學任教，對普京的忠誠度較高，最後便成爲普京的接班人。此次接班人的選擇，亦意味著俄羅斯政局的變遷，標誌著普京與強力部門幹部之間的關係變化。

三、梅普時期－法治派（Siliviki）的制衡

普京第一次執政時期，曾任用蘇爾科夫（Vladislav Yuryevich Surkov, Владислав Юрьевич Сурков）等法治派人士（Siliviki, цивиликов）[4] 爲其威權統治量身訂作適當的說辭，此股勢力於梅德韋傑夫時期開始茁壯，成爲抗衡強力部門幹部的重要力量。梅德韋傑夫上台後，便積極處理強力部門擅權問題，首先在政府中快速建構法治派體系，將原本強力部門掌控的若干權力轉移至法治派體系人士，這些新進官員的學識及專業能力皆高於權力部門，使得俄政府注入一股新勢力，帶領俄逐漸朝現代化國家邁進。曾有學者將梅德韋傑夫引進法治派人士的行爲解讀成對抗普京勢力的手段之一，然而對於普京來說，強力部門幹部原爲其掌握實權及權力鬥爭的重要工具，當普京完成權力的掌控後，亦開始思索如何除去這些氣燄囂張的幹部。因此就強力部門的存廢立場觀之，梅普之間不僅沒有相互衝突，反而具有共識。

早從梅德韋傑夫擔任第一副總理時，便致力於國內的反貪腐行動，梅氏曾於 2008 年 3 月下令執行反貪腐措施，針對一些政府部門進行整肅，例如消防、衛生及警察單位對中小企業的收賄行爲。由於強力部門幹部多爲

[4] 法治派人士，通常係指與強力部門幹部相對峙的一股勢力，此股勢力人士多具有高學歷，並擁有高度專業知識，與強力部門幹部形成強烈對比，例如謝爾科夫即畢業於莫斯科國際大學（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 Moscow,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 Москве），並取得經濟學碩士。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前蘇聯官僚，在官員的風氣上亦多承襲前蘇聯的模式，收賄情形屢見不鮮。梅氏雖表示，反貪腐行動的目的主要係爲提升小型企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中的比例，未來的目標是從現在的 15% 提升至 50%，然而這些整肅的對象多半爲強力部門幹部，此反貪腐行動實則爲剷除強力部門幹部在政府機關的重要手段之一。2010 年 7 月，梅德偉傑夫向媒體表示，國內反貪腐的作爲仍無實質進展，反貪腐的作爲已淪爲法案及相關文件的簽署行動，實際執行的成效仍尚未顯著。事實上，自 2008 年《國家反貪汙賄賂計畫》及《國家反貪污賄賂法》後（Электроронный pecypc, 2008），俄的反貪腐政策即已邁入制度化發展，光是 2011 年上半年爲止及 1600 多名官員因貪腐遭到撤職（俄羅斯之聲，2011）。而 2011 年 12 月，普京曾向媒體表示，這些貪腐與統一俄羅斯黨並無關係，而係與現任政府有關，似乎有意保護其所屬的統一俄羅斯黨，由於該黨中的強力部門幹部仍屬強大，而剪除強力部門幹部則勢必拖垮統一俄羅斯黨的名聲（俄新網，2011）。

四、普京第二次執政時期－反貪腐打擊強力部門幹部

普京從 2012 年以來的第二次執政仍以反貪腐做爲壓制強力部門幹部的有效手段，在反貪腐過程中，亦偶有出乎意料的發展，例如 2012 年 11 月俄國防部長謝爾久科夫（Anatoliy Serdyukov；Анатолий Эдуардович Сердюков）被以侵吞國有資產的理由展開調查而後遭到撤換（РосБизнесКонсалтинг, 2012），謝氏爲新引進的法治派人士，從蘇聯時期列寧格勒貿易學院畢業後，普京借重其專業管理才能，將其安插至國防部領導軍事制度改革，其上任後便大幅改革軍中制度。謝氏的改革約可歸納爲三大點：其一，軍隊權力的下放，意即將俄軍事總參謀部的作戰指揮權下放至軍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手中；其二，縮減軍隊編制，將傳統的軍隊編制加以改革，以小型的快速反應部隊爲發展目標。除了將陸軍的主要作戰兵團最高編制改爲旅外，軍隊總員額亦由 104 萬人縮編到 100 萬人以下；其三，縮減軍事中央機關編制，國防部中央機關員額原本編制爲 5 萬多人，改革後則壓縮到 1 萬人。

謝爾久科夫原本深受普京賞識，並被期待能革新俄軍隊的制度，藉由

臺灣大學圖書館授權使用

權力的下放改變原本軍中的擅權現象，當然這些改革仍主要係針對強力部門幹部，謝氏的改革遭受軍中強烈反彈，再加上謝氏本身確有侵吞國有財產之嫌，使得普京不得不親手除去此親信，改由紹伊古（Sergey Shoygu；Сергей Кужугетович Шойгу）接任國防部長。然而儘管謝氏有侵吞國有財產之嫌，總理梅德韋傑夫仍對其工作效率多加肯定（俄新網，2012）。此外，紹伊古係出身於強力部門幹部，普京令其出任國防部長頗有安撫強力部門幹部之意。

俄羅斯獨立至今，實施民主政治已逾 24 年，歷經三位總統的執政，這三位總統的統治皆與利益集團關係密切，現今的政治利益集團仍以強力部門幹部爲主，然而普京對於該股勢力的掌控已經相當成功。如果以西方的角度觀之，政治利益團體必定是未來俄羅斯民主發展的絆腳石，是普京政治勢力的重要支柱，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利益團體或許也可能成爲推翻普京統治的重要關鍵，端視未來俄國國內政治情勢的變化。

肆、結論：俄羅斯利益團體在政治體制中之特別作用

綜觀俄羅斯獨立至今，經濟利益團體與政治利益團體常掌控著國家的政治權力，葉爾辛時期的經濟利益團體係以寡頭爲主，而這些寡頭係因俄羅斯獨立初期的經濟改革而生，憑著價格自由化及私有化改革而日漸茁壯，而後在 1996 年的俄總統大選中掌控媒體，並與葉氏交換政治酬庸。如此的經濟利益團體與西方傳統的經濟利益團體相去甚遠，並掌控國家全面性的權力，無論是政治、經濟或軍事，並形成與西方民主政治完全相左的「寡頭政治」，葉氏成爲形式上的傀儡總統，連競選連任都要求助於他們。傳統的政治利益團體是在民主政治下，一群人具有共同的目標，爲了達到此目標而遊說政府或協助國會候選人，使目標的達成成爲可能。

然而俄羅斯獨立初期的經濟利益團體，是影響其民主政治發展的主要因素，藉著葉氏所構築的半總統制，控制政府政策，或直接擔任政府要職形成政策，這些情況皆肇因於前共產國家政經轉型下的餘毒。實則這些寡

臺灣已授權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頭多來自前蘇聯政府中的官員，因爲私有化政策而獲得大量財富，是實施震盪療法的漏洞所造成。這些經濟利益團體因爲 1998 年的金融危機與政權更迭走向式微，葉爾辛執政末期曾擬定消除寡頭的規劃，卻因爲金融危機與葉氏個人的下台而未及實施。本文認爲，寡頭並非因爲葉爾辛或普京的相關規劃而失勢，寡頭的生成主要係由經濟改革而來，因此對於寡頭來說，最重要的便係集團的資產及獲益，此觀諸 1998 年金融危機後衰弱的寡頭便知。另一方面，寡頭對於政治權力的掌控有賴於與統治者或重要官員間的政商關係，俄羅斯的半總統制使得領導人掌握名義上的所有權力，是以只要領導人更迭，而非原先寡頭所經營的政商關係所能及，寡頭便需要再次建立與領導人間的政商關係。

普京的上台（代理總統）適逢對車臣的戰事爆發，使其有機會獲得民心，無須仰賴寡頭所提供的媒體服務。然而金融風暴又使得這些寡頭元氣大傷，在一連串有利於普京的情勢下，普京獲得實施打擊寡頭的機會，並且確實掌握這些機會。普京也透過地方自治制度的改革，將自己勢力的人馬（強力部門幹部）安插入七大聯邦區擔任全權代表，並使其兼任國家安全會議委員。寡頭的失勢同時預示著俄羅斯經濟利益集團的時代已邁向終點，以及政治利益集團的崛起。

普京引入的強力部門集團，逐漸取代寡頭的政治勢力，這股勢力不僅存在於國營企業的高層，更進入政府部門擔任官員，使俄羅斯形成一種新類型的利益團體，橫跨了政府機關與國營企業。於 2007 年與統一俄羅斯黨整合後進入權力高峰期。然普京亦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當強力部門幹部的勢力過大時，便開始思考如何平衡這股勢力，此時普京亦面臨到任期的限制，便令梅德韋傑夫出任競選總統，自己則擔任總理。在普京第一任期時，便開始培養法治派人士，這股勢力至梅普時期逐漸茁壯，梅普便開始透過反貪腐的口號整肅部分違法強力部門幹部，藉以生殺雞儆猴之效。普京深知要剪除強力部門幹部並非一朝一夕可成，貿然躁進會肇生自身政權的危機，因此在清除謝爾久科夫之後再補入同爲強力部門幹部的紹伊古，除了可以降低強力部門幹部勢力的反擊與疑慮外，更可使外界深信普京的反貪腐政策係眞，獲取民心加深自身的政治實力。就西方的政治利益團體來說，俄羅斯的政治利益團體已經超越傳統的利益團體功能，強力

臺灣大學圖書館授權

部門幹部具有同樣的時代生成背景，在政治立場上也較爲保守，多具備前蘇聯時期官員的特徵。

然而強力部門幹部的消除與除去寡頭的方法迥異，綜觀普京對付強力部門幹部的方式，採取如同寡頭的方式，控訴這些勢力的人馬曾做違法行爲，在迫使他們逃亡或深陷囹圄。這樣的方法無法使其大量退出權力核心，或許普京本身並無使其完全消滅之意，僅係記取葉爾辛時期的教訓，要達到一種國內政局勢力較爲平衡的狀態而已。

根據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利益團體的發展與西方國家的利益團體大相逕庭，且利益團體可當作俄國威權政體的墊腳石或工具。在葉爾辛時期，「寡頭政治」取代長久以來的蘇聯共黨威權統治。而「寡頭政治」如果依照亞里斯多德的觀點，便是由少數人統治與少數人獲益，然而葉爾辛時期的「寡頭政治」卻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加以包裝。獨立初期的俄國面臨政治轉型，一般而言，威權體制的政治轉型需要經過兩個步驟：威權體制的鬆綁與民主體制的建立，蘇聯的解體雖然造成威權體制的鬆綁，而後俄羅斯的憲法亦詳細的規定民主體制的運作。但是由於經濟改革的失敗，造成寡頭的崛起，成爲實質上「寡頭政治」、形式上「民主政治」的特殊情況。因此若單就政治轉型觀察，葉爾辛執政初期的確都已完成兩步驟的實施，卻無法完成民主化改革，可見政治轉型的要素除了上述兩步驟以外，尚須考慮其他的變數，例如，國內經濟改革的成敗等，這些都是共產國家在政經轉型過程中的特殊現象。

普京的上任雖然造成「寡頭政治」的瓦解，卻又引進強力部門幹部，因此又形成政治利益團體當權的局面，這些強力部門掌權的情形，或許可用「菁英政治」稱之，然形式上仍以「民主政治」來包裝。最後普京將法治派引入，藉以制衡強力部門幹部的勢力，然而普京的勢力卻越來越大，使得俄羅斯走向「半總統制」的狀態。由上可知，或許俄羅斯獨立後，在民主體制的建立上已大致完成，威權體制的鬆綁卻始終難以成功，從「寡頭政治」、「菁英政治」到「半總統制」，人民始終無法眞正當家作主。另外，以利益團體來研究俄羅斯的政治發展，不僅可以比較俄國利益團體與西方國家利益團體的異同，更可以了解俄國政治體系或權力結構與西方國家的差異。

臺灣上游學術期刊資訊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Jacques-A Basso 著，陳浩譯，1990，《壓力團體》，台北：遠流出版社。譯自 *Les Groupes de Pression*. Lincoln: Vendeur Anybook Ltd. 1983.

尹慶耀，1995，《獨立國協研究－以俄羅斯爲中心》，台北：幼獅出版社。

王定士，2001，〈俄羅斯金融寡頭在民主化與經濟改革的角色〉，《俄羅斯學報》，(1): 11-60。

田浩卓，2006，〈曾富可敵國：回首俄羅斯七大寡頭下場〉，中國經濟網，http://big5.ce.cn/gate/big5/www.ce.cn/finance/financing/chat/200606/08/t20060608_7257938_1.shtml，2015/8/8。

俄新網，2011，〈普京：國民指責政府官員偷竊腐敗而不是統俄黨〉，俄新網，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neizheng/20111206/43242743.html ，2015/9/7。

俄新網，2012，〈梅德韋傑夫認爲謝爾久科夫是一名工作效率高的部長〉，俄新網，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neizheng/20121207/43639007.html，2015/8/30。

俄羅斯之聲，2011，〈2011 年上半年俄反貪行動 1600 多位官員下馬〉，俄羅斯之聲，http://tchinese.ruvr.ru/2011/12/13/62134980.html，2015/9/12。

高永光，2003，〈美國州憲之研究：利益團體的分析〉，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頁，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2/CL-R-092-035.htm，2015/8/5。

張世熒，2000，〈利益團體影響政府決策之研究〉，《中國行政評論》，9(3): 23-52。

張亞中，2007，《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出版社。

張樹華，2001，《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北京：新華出版社。

郭武平，1999，《俄羅斯的政黨政治》，台北：五南出版社。

陸南泉，2007，〈俄羅斯經濟轉軌過程中的所有制改革〉，《黑龍江社會科學》，(5): 29-31。

劉向文，2001，〈談俄羅斯聯邦總統的全權代表制度〉，《東歐中亞研究》，(6): 24-31。

謝青雷，1988，《衝突與妥協：美國利益團體與遊說活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西文部分

Almond, G. A. & G. B. Powell, Jr. 1978.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Arkady O. 2013. “An oligarch’s sudden death: Boris Berezovsky.” in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easternapproaches/2013/03/oligarchs-sudden-death. Latest update 25 September 2015.

Cardiff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2010.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 in http://www.cf.ac.uk/socsi/undergraduate/introsoc/weber7.html. Latest update 4 September 2015.

Central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2004. “Viktor Chernomyrdin.” in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ved=0CCYQFjAB&url=http%3A%2F%2Fwww.cs.ccsu.edu%2F~gusev%2FRussian%2Fvcbio.html&ei=wiYxVeiPFsq78gWbhIG4Cg&usg=AFQjCNHSmocE1latM5IevBhUQxJEPMNOAQ. Latest update 7 September 2015.

Colton, Timothy J. 2000. *Transitional Citizens: Voters and What Influences Them in the New Russia.* MA: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Daniels, Robert Vincent. 1998. *Russia’s Transformation: Snapshots of a Crumbling Syste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14.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in http://www.fec.gov/rad/pacs/FederalElectionCommission-RAD-PACs.shtml. Latest update 7 August 2015.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15a. “Chapter 8 1998: Years of Bad Advice Culminate in Russia’s Total Economic Collapse.” in http://fas.org/news/russia/2000/russia/part08.htm. Latest update 6 August 2015.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15b. “The Basic Provisions of the Military Doctri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ttp://fas.org/nuke/guide/russia/doctrine/russia-mil-doc.html. Latest update 6 August 2015.

Globalsecurity.org. 2015. “Military Industry Under Yeltsin.” in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russia/industry-yelstin.htm. Latest update 8 August 2015.

Hancock, M. Donald and John Logue. 2000. *Transitions to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Russia and Central Europe.* Connecticut: Greenwoood Publishing Group.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14. “Russian Federation Parliamentary Chamber: Gossoudarstvennaya Duma Elections Held in 1993.” in http://www.ipu.org/parline-e/reports/arc/2263_93.htm. Latest update 9 September 2015.

Klein, Naomi. 2007. *The Shock Doctrine: A Short summar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Kolb, Robert W. 2007. *Encyclopedia of Business Eth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臺灣大學論文電子資料庫

Levine, Herbert M. 1982. *Political Issues Debated: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New Jersey: Pentice-Hall.

Lowi, Theodore J. 2009. *The End of Liberalism: The Second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4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Newton, Julie and William Tompson. 2010. *Institutions, Ideas and Leadership in Russian Politic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Paul Pross, A. 1986. *Group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guly, Eric. 2012. "The Lunch At home with Russian oligarch Oleg Deripaska." in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business/careers/careers-leadership/at-home-with-russian-oligarch-oleg-deripaska/article573998/?page=all. Latest update 23 August 2012.

Russian Mafia. 2010. "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Березовский." in http://www.rumafia.com/person.php?id=42. Latest update 20 August 2015.

Russian Mafia. 2015. "Vladimir Potanin." in http://www.rumafia.com/en/person.php?id=94. Latest update 15 August 2015.

Seely, Robert. 2012. *The Russian-Chechen Conflict 1800-2000: A Deadly Embrace: A Deadly Embrace*. New York: Routledge.

Smith, Alan. 1995. *Challenges for Russian Economic Refor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Truman, David. 1973.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University of Essex. 2002.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http://www2.essex.ac.uk/elect/database/indexElections.asp?country=RUSSIA&election=ru2000presidential. Latest update 26 August 2015.

Wilson, Graham K. 1981. *Interest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Ольга. 2005.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Мартынов, Аркадий. 2010.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лан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Коррупции." *Общест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6): 3-30.

Медведев, Ро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2001. *Время Путина?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Москва: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0.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in http://www.ng.ru/politics/2000-04-22/5_doktrina.html. Latest update 23 June 2016.

Ноу "ИПП". 1995. "'Золотой Парашют' Для Топ Менеджера." in http://www.ippnou.ru/article.php?idarticle=00128. Latest update 21 August 2015.

Политика. 1996. "Фракции и Групп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II созыва." in http://www.politika.su/fs/gd2frac.html. Latest update 9 September 2015.

Правда о Путине. 2016. "Путин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in http://pravdaoputine.ru/biography-putin. Latest update 25 June 2016.

РосБизнесКонсалтинг. 2012. "Следователи Обыскали Коттедж Анатолия

臺灣人口與政治資料庫

Сердюкова.” in http://www.rbc.ru/politics/23/11/2012/826612.shtml. Latest update 23 June 2016.

Скакунов, Э.И. 2000.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оциолог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5): 12-15.

Электро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2008.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лан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Коррупции.” in http://www.rg.ru.2008/08/05/plan-dok.html. Latest update 5 August 20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Interest Group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ong-yi Lien***

Abstract

Industrial revolution not only changed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but also triggered the social change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last few hundred years when western democratization took place, the role of interest groups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re was no interest group in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due to its political system-Socialism and Communist one party rule. After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the political reform in Russia tended to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adopted shock therapy to make a quick transition to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Accordingl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est groups was thriving in Russia, but the types and effects of interest groups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First of all,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characters, types and developments of Russian interest groups, and then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ussian interest groups and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Keywords: Interest Groups, Pressure Groups, Russ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Oligarchs

臺灣人文及社會期刊資料庫

* DOI:10.6166/TJPS.68(77-102)

** Dr. Hong-yi Lien, associate professor, now serves at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Taiwan. He got Ph.D. degree in the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GIMO) in Russia. His major academic field focuses on four issues: Russian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 defense policy and strategic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mail: hylien@nccu.edu.tw